书人茶话

阅读，是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

——2023年那些难忘的书

周立民

“去岁到今年，时光一贯如棍棒。”一个岁末，川端康成在镰仓车站庭院中看见高滨虚子的俳句，“十分惊奇，甚为感佩。这是大家之言，我仿佛遭到了禅宗的当头棒喝”。（《美丽的日本与我》，陈德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伟大的作家通常都是了不起的发现者，时光无情，年终整理阅读心情时，我也有被棒喝的感觉。有多少书我还想再看一遍啊，就这么匆匆合上了，我不甘又无奈。

毕竟是经典

在书堆里，川端康成大大小小就有好几套。如果去书市上转一圈，到底有多少个版本的《诗经》《论语》《史记》《红楼梦》，恐怕是算不清楚的。

经典名著的大量甚至重复出版，商机而外，可能也是读者的心灵所需，劳碌奔波中发现心灵的荒原更需要打理，便选择了亲近经典。为了能够让读者亲近经典，出版者可没少放大招：人民文学出版社打恋旧牌，四大名著不断推出老版本的纪念本；商务印书馆出版《十三经汉魏古注丛书》时，“为了适应现代人的阅读习惯，这套丛书改直排为横排”（见朱杰人《丛书序》）；中华书局则请学者陈引驰主编“中华经典通识”系列丛书，“轻松简明地讲透一部中华传统经典”。中华书局还精心策划推出刘勰编著的《左传通识读本》，厚厚六大卷，带领当代读者读通读透《左传》，这部大书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最新成果融汇其中，又解决了当代人阅读中的诸多拦路虎，使之成为最可亲近的《左传》导读本。

印象中只有古典的作品才配享详细注释，谁想到当代作品的注释本也摩拳擦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之前推出一部“导读珍藏本”，我以为已足够了，不料，很快就来了一本厚厚的《洛丽塔：注释本》。细读才知，这还是纳博科夫生前就认定的本子。做这个工作并非编者闲极无聊，而是他认为“从但丁到《迪克·特雷西》，自古至今的典故、双关语和诙谐模仿组合得浑然一体，在《洛丽塔》中的运用如此得心应手，那是乔伊斯（于1941年逝世）之后任何一个作家所望尘莫及的”。在900条注释的“帮助下”阅读当代小说是一种特殊的体验，有那么一刻我真是怀疑自己以前的阅读原来是那么“不求甚解”，否则怎么可能放过那么多的知识点呢？更过分的是“我城”经典《繁花》也有了批注本（沈宏非批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看电视剧的同时，也拿着一本批注本在翻查。

保持住良知中的人性不致错乱

马齿徒增，我的阅读更愿意咀嚼细粮，经典作品的阅读比例越来越大。过去读得一知半解之处，生命的经验慢慢都融化了它们，爱屋及乌，对经典作家也格外关注。

今年关于托尔斯泰，至少有三本书引起我注意：《托尔斯泰为伴：与李翊云共读〈战争与和平〉的八十五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难得的一本细读《战争与和平》的书，藉此书与原著共读，颇可获益。俄罗斯的新一代研究者帕维尔·巴辛斯基的两本书史料丰富，可读性强，它们是《安娜·卡列尼娜的真实故事》（刘文飞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逃离乐园：列夫·托尔斯泰》，后者以新材料讲述了托尔斯泰离家出走并死亡的老故事。巴辛斯基文笔好，叙述中还表现出对于各方当事人的充分理解，让我们看到集神人、伟人、凡人于一身的托尔斯泰。

操持家务的妻子写信给托翁详细列述家中各项开支，不乏让头脑发热动不动就要放弃财产的托翁清醒清醒的意思吧，这位大作家给妻子回信：“亲爱的，你把钱财问题看得太重了，账算得这么细，我都生气了……”离家出走的剧本托翁先后策划了25年，遗嘱也有七份，一切显然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尽管1910年10月27日（俄历）深夜的离家更像仓皇出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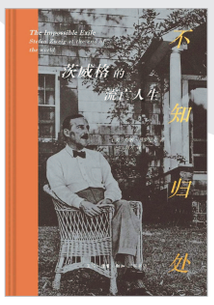
在寒风中的这次出逃达到了这位伟大作家晚年一再心心念念的“我唯一的归宿，便是远离尘嚣，独自一人度过人生最后的一段时光”目的了吗？显然这是一厢情愿，伯爵大人没有走出多远，新闻记者、警察、省长、教会等各方面就开始关注他，他生命中的最后那一段时光早已上了新闻，成为俄罗斯甚至全世界谈论的话题，连他最简单的想摆脱妻子的这一目标也没有实现。他的女儿萨沙后来描述在火车站候车室中的老人：“他两唇翕动，全身发抖，瑟缩着像秋风里一片将落未落的枯叶。看他支持不住，我劝他躺在沙发上休息，但是他断然拒绝了我的请求。女士候车室的大门紧闭着，门外是一大群期望一睹托尔斯泰容颜的好奇旅客。”这是为坚持自己的信念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吗？

今年是波兰诗人米沃什的出版年，除了一部厚重的《米沃什传》之外，《旧金山海湾景象》《伊萨谷》《欧洲故土》等米沃什随笔集的推出，都直接呈现了诗人锋利的思想。米沃什一心要出国与怀孕的妻子团聚。“我在国内的这段时间，得出了结论：要竭尽全力，去达到人可以达到的最高境界，以避免变成魔鬼。人甚至哪怕是愚蠢，可是善良且有经验……”70多年后，我从这部115万字的《米沃什传》中读到这样的文字时，内心还是受到了震撼。某种时候，文学大师就是一座座纪念碑，不仅供我们瞻仰，还是一种价值观念的铭刻。顺便说一下，这些优秀的大部头传记都收在魏东主持的一套“文学纪念碑”丛书中，这是近年来我的阅读良伴。约翰生、济慈、雪莱、华兹华斯、布莱克、纳博科夫、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哈代、惠特曼、马雅可夫斯基等众多作家的传记，乃至艾略特的艺术等专题研究著作，都在文学纪念碑的园林里，这是一座壮观的阅读森林。

《洛丽塔·注释本》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美]小阿尔弗雷德·阿佩尔 注
主万 冯洁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逃离乐园·列夫·托尔斯泰》
[俄]帕维尔·巴辛斯基 著
何守源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米沃什传》
[波兰]安杰伊·弗劳瑙塞克 著
乌兰 李江颐 李佳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不知归处·茨威格的流亡人生》
[美]乔治·普罗尼克 著
刘芳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还有谁谁谁》
黄永玉 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敦煌！父亲的召唤》
常沙娜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1936年，茨威格最后一次来到萨尔茨堡。茨威格的上千卷藏书被运走，部分赠给了维也纳的国家图书馆，还有一些赠给了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他收藏的手稿目录和“上帝知道还有些什么东西”都不见了，也再没有出现过。焚烧结束后，茨威格独自从房子里离开。一个老朋友在下山的路上遇到了他，他脸上的凝重令人害怕。（《不知归处：茨威格的流亡人生》）

茨威格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寒酸地流亡，很幸运，他经济条件很好，租得起房子，也住得起宾馆，甚至还资助过其他流亡者。然而，告别他的藏书、珍藏的手稿、熟悉的朋友，还有维也纳的生活，总是让他焦虑不安、郁郁寡欢。因为在他的心中，个人生活之外还有高悬在上的信念，正如他在读蒙田时所写的笔记：“对一个不愿为这样的时代而丧失自己的人性的人来说，一切一切的问题都归结为一个唯一的问题，那就是：我怎样保持住我自己的自由？尽管有种种威胁和危险，我怎样……坚定不移地保持住自己头脑的清醒？我怎样在这种兽性之中保持住良知中的人性不致错乱？”他等不及了，在向朋友告别信中，他问候朋友：“愿他们在漫长的黑夜之后还会看到朝霞！而我，一个过于缺乏耐性的人先他们走了！”

老托尔斯泰魂归天国之前，说的完整的一句话是：“我内心深处……爱着那么多人……我爱所有人。”这些伟大的心灵都在祝福人间。看到他们遭受的凄风苦雨，让我心疼。

人只要笑，就没有输

人们常说，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告别。2023年有太多的告别，现在想来，心里仍不免酸楚。

年初，我病殃殃的，没有精神，有几天是一面捧读《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余斌撰写，译林出版社出版）一面打听杨苡先生的情况，并默默祈祷老太太能渡过难关。我还想象，老太太在家里接待我们，大家讨论这本新书的情景。我想她一定笑得合不拢嘴，一定还会补充一些书里没有的“八卦”。这本书，上半部分是家史，原生态地呈现了一个民国大家庭的样貌，很多故事，杨先生不讲恐怕就随风飘散了，她讲出来，也算了却一桩心事。后半部分，可称现代文学副史，有些故事听杨先生以前也讲过，集中起来重读，那些逝去的人和事又复活了，那么生动地走到我们眼前……然而，杨先生还是走了。我默默地合上这本书，这一年来再也不想翻开。

因为告别，今年我重读了不少书。作别李文俊，重读《喧哗与骚动》；辞别杨义，又拿出了《中国现代小说史》；送姜德明远行，我又读起《余时书话》；还有1990年代读过的《周涛散文》，也因这位作家的突然辞世，让我又翻开了。米兰·昆德拉有一本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阅读也是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怀着十分复杂的感情，翻起这些书，相逢又分开，他们远去了，他们的文字却长留我心间。想不到，今年7月11日，米兰·昆德拉也挥手作别他的读者……感谢这些作者，与他们的书相逢，令我的生命时光像秋天的谷粒一样饱满。

今年让我最伤心的告别还有黄永玉先生的去世。得到他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喧闹的北京南站，他刚刚出版的散文集《还有谁谁谁》就在手边。老人家并不讳言生死，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就扳着指头算离一百岁还有多久，还有多少画没有画完。《还有谁谁谁》是黄先生的最后一本书，可以看作是《比我老的老头》的续编，也可以当作《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外编。书里写了很多人物，这些人被他写得俨如《世说新语》中的人物，性格各异，活灵活现，却并未超凡脱俗。在黄先生的记忆中和笔下，他们是一张张笑脸，一个个鲜活的灵魂，还有讲不完的生动故事。这不是松松垮垮的回忆文字，而是声情并茂的上好文章。有时候，就觉得黄先生在你面前，文字里有声调，有表情，有手势……黄先生经历了惊涛骇浪的大时代，在他的书里有一种特殊的智慧，每一次读他的文字都在经受着慷慨的人生教育。我最欣赏的是他的达观，不斤斤计较，也不患得患失，正像他晚年说的：人只要笑，就没有输。

在岁末的低温中，我读了常沙娜的《敦煌！父亲的召唤》，她的父亲是“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没有传奇，没有八卦，有的是大漠孤灯、与艰苦相伴，然而在这些前辈们身上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还有献身理想、安贫乐道的品质，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岁月的行为也让我感动。虽然在功利的社会中它们更像一星灯火，感觉上很遥远，却又能让人感受到温暖，正是这一丝温暖让寒夜中独行者有了一分勇气。如此想来，与那些前辈告别的悲伤冲淡了不少，我相信他们的精神是不灭的，正如我那些远去了的亲人，他们的恩情在我心中永在。

我又想到了川端康成，他的名作《古都》中写到真一和千重子这一对少男少女去平安神宫看八重红枝垂樱，艳红的八重樱弯弯地垂挂下来，微风拂过，花瓣飘零，树下是这对正当好年纪的男女，男孩对女孩说在幸福的姑娘身边，“品味着幸福的甜美，温暖而富有朝气”。这样的时刻一辈子难忘吧，虽在严冬，我还是盼着繁花似锦的春天，期待去看属于我的八重红枝垂樱。

好书过眼

穿过中国百年史的铁路

王振羽

铁路之于人类历史的进程，是一巨大飞跃。当然，它也是工业化的产物与硕果。设若没有蒸汽机的发明，怎会催生铁路的迅猛崛起？但作为交通工具进入中国的铁路，却遭遇了非比寻常的艰难曲折。这一曲折已经被多人研究，而一位德国女学者的研究与解读，可谓别具只眼，这就是柯丽莎的《铁路与中国转型》。

鸦片战争爆发，坚船利炮，轰鸣而至。各种条约，纷至沓来。如何应对西方？怎样动员人力？何以实现富国强兵？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中法战争也好，左宗棠抬棺西征也罢，沙俄染指东北处心积虑的就是以修铁路来满足其狼子野心，更有甲午之战，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日俄战争在中国上演的荒唐离谱……凡此种种，再争论铁路建设的有无，再喋喋不休铁路修筑是否会影响祖先风水，再计较外国资本的介入会否动摇国本，就实在是太过冥顽不灵了。现实比人强，正是在这样的前后大时代背景之下，张之洞离开岭南广州，沿水路北上，经上海到达湖北武汉，南北联动，修筑芦汉铁路，这一修，真是一波三折，坎坷不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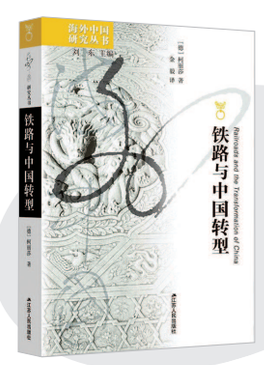
柯丽莎在美国的一家图书馆内看到的是关于沪甬杭、南粤、津浦这三段铁路修筑运营的有关资料，她细读之后，大受启发，兴趣顿生，尔后她由此步步深入，细究此后铁路建设在中国的跌宕起伏。需要指出的是，在进入民国之前，也就是说，在1912年之前，中国的铁路建设已经披荆斩棘，有了一定基础。当然，大清垮台的导火索，也与修铁路有关。

一战前夕，欧洲铁路建设突飞猛进，这是因为战争的阴云笼罩。一战之后、二战之前，中国的铁路怎样推进，这一轨道交通如何管理？民众的时间观念、出行习惯如何调整？京沪线、陇海线、京广线，纵横中国大地，有战争的纷争，有军阀的袭扰，有地方势力的较量，有铁路沿线的各种利益的纠葛，柯丽莎都注意到了，也都尽其所能，一一梳理，一一解读。柯丽莎的研究，以制度和机构切入，围绕人的能动性，以津浦铁路为主线，利用大量的原始档案，就铁路的技术、管理、市场贸易、人口迁移等，探究中国近代铁路的发展及其对中国近代的深远影响。借助于铁路这一视角，柯丽莎考察百余年来中国的发展和转型，探讨铁路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中国的具体国情、纷纭人事又是如何反过来塑造作为科层系统和经济系统的铁路这一新生事物。

柯丽莎在书中反复使用机构这一概念，她从铁路机构的组织运作出发，解读与之相关的技术、管理、市场、观念、政治、战争等问题，构建出关于中国铁路的德国人风格的综合性叙事。通过梳理，她也对中国近代史以来的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断裂与延续、本土与外来、精英与民众等宏大议题展开深入而非浮泛的讨论。她谦逊地说，自己的研究不是中国近百年的铁路史，不是整体性地描述，只是在局部点面上的勾勒，她遗憾于没有涉及满铁，没有涉及更为宏观的铁路领域，就铁路在中国的艰难转型中的巨大作用，她更注意的是铁路本身的规划运营、科层管理，以及铁路内在的沟通磨合、自成一体。

1949年以后的铁路建设与管理，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此书的翻译者金毅来自巴蜀，他对大西南的铁路建设因自己的出川求学而有着格外的感知。伴随着路轨的不断延伸，铁路建设与管理的更新迭代，柯丽莎探幽发微深入寻访到了当年的铁路工人、铁路的管理人员，留下口述史料，也留下特定年代的时代痕迹。柯丽莎还注意到了王晓华等人所著的《艰难延伸的民国铁路》，征引文献，审慎精当。柯丽莎对徐州铁路局、郑州铁路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运作状况、政治生态也都有一定的涉猎，读来让人兴致盎然。

铁路不同于水路、高速公路和航空等交通运输，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它都有自身得天独厚的优势所在，而伴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高铁时代的不速而至，说铁路又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给人类带来色彩斑斓的故事传奇，也并非言过其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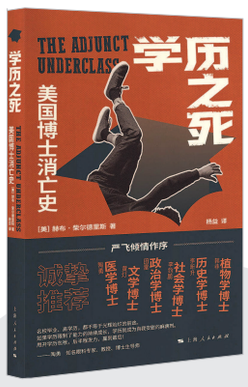


《铁路与中国转型》
[德]柯丽莎 著
金毅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味书屋

美国大学教师为何沦为社会底层

叶克飞



《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
[美]赫布·柴尔德里斯 著
杨益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些年来，人类见证了许多职业乃至行业的消失或正在消失。但也有一些职业，看似高大上，甚至被视为永不会消失，实际上却呈现“隐形消失”的状态，正在谁都想不到的情况下面对困境。在美国学者赫布·柴尔德里斯看来，大学教师就是这样一个职业——“曾经身负重托，为培养干练自信的下一代画上点睛之笔的大学教师，却被认为不该享有工作保障和健康保险，也不该比便利店的员工获得更多报酬。”

如果要拿一个行当来类比大学教职，最恰当的或许是大多数人都无法想象的外卖员，因为在美国，大学教职的分配逐渐零工化。如果将这些教师的上课时间、备课时间和课后工作时间全部计算在内，收入甚至还达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1975年，美国只有30%大学教师属于临时或兼职岗位，但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超过50%，如今更是超过70%。曾经以终身教职吸引人才，长期插根校园从事研究和教育的大学教师职业，竟然渐渐被兼职人员所主导。

赫布·柴尔德里斯在这本《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中这样总结：一切不过是“重新下定义”，几番运作之后，大学教师成为校园里的局外人。而作为一种职业，它正以细微、隐秘但又明确的方式渐渐消亡。

这实际上是美国版的“青椒（指青年教师）之困”，也是职业幻灭感的大学校园版。那些踌躇满志、认为将迎来人生新起点的博士们，不会想到自己的执教生涯早已被预设为机器化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有早已确定的课程大纲，有处于最低水平的时薪，有不具备任何保障的合约。

这种困境并非单纯的就业问题，正如《学历之死》中所总结的那样，美国博士人才供应过剩，才导致大学教职竞争激烈，青年教师进入学术圈的几率相当低。而且，博士生的培养模式出现问题，他们无法胜任其他职场工作——“尽管兼职教师和博士后研究人员确实可以离开高校，投入制药或金融行业（收入总比当个教授来得多），但是，那种在优质的博士教育过程中训练形成的思维模式，并不适合大部分职场环境。”

当然，这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大学教育，因为大学本身就有着象牙塔的一面。赫布·柴尔德里斯写道：“商业领域奖励的是‘专业性’——那种你知道你能将事情做得又快又稳妥的能力。而学术领域奖励的内容刚好相反——那种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那种对现有知识和现有做法的不满，以及重新审视自身认知基础的冲动。之所以把学术型博士学位称为‘哲学博士’是有原因的，因为不管什么专业，都是以拥有批判精神为目标来训练博士生的，使他们带着玛莎·格雷厄姆所形容的‘一种古怪而神圣的不满、一种受到祝福的不安’遗世独立。这种不满，与银行和保险经纪公司的职场氛围格格不入，它既不能应付季度性投资总结报告的要求，也无法适应超市或政府办公室的管理工作。”

大学教师面对的生存困境同样也不仅仅是大学的问题，调查显示，过去十几年里，大批年长员工仍然活跃在原先的岗位上，使得年轻人很难获得机会，几乎每个行业都是如此。高校教师领域之所以特别明显，是因为年长的教师都享有终身职位，年轻人的入场门槛更高。书中写道：“如今，成为一名终身制教师的过程无异于成为一名职业冰球选手。你得从四五岁就开始一路过关斩将，在体育发展联盟中脱颖而出，为全美青少年赛队效力，或许还得考上美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冰球项目的四大盟校才行。你的竞争对手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人生优势，而你必须找到能与之势均力敌的某种方式。”

对学者的要求也一样，赫布·柴尔德里斯写道：“你得出生于书香世家，顺利考上名牌大学的本科，然后攻读名校的博士学位，在这期间不能因为工作或其他某种冲动严重耽误求学进度。这还意味着，你一拿到博士学位，最好能立即成为科研项目的助理，以共同作者的名义发表论文，并得到主要科研资助机构的认可；而不是立即参与助教工作——这只能说明你成了一名默默无闻的教学服务人员。一位30岁左右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自然会得到经历相仿、条件相似、同样幸运的同行的认可。”

要实现这种层层跨越和无缝连接，难度极大，不仅仅需要个体努力，很多时候还需要家庭背景和运气。“不论在哪个阶段，这一选拔机制都像是一档智力竞猜节目，不断向参赛者提出新的挑战，而他们也能在挑战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优缺点。这是一个覆着保护膜的虚拟世界。”

但事实上，这一切终究是幻象。一代代年轻精英沉浸于这一系统框架中，渴望被评价，也习惯俯首听命。书中告诉人们，美国临时教师规模的扩大，伴随着的是按需而定的宗旨，它是一种标准化运作的产物，也是资源流向的见证。因为等级的存在，不公也如影随形。金字塔底端的助理教师承担了最多的教学任务，次多的是全职非终身制教师，而全职终身制教师反而是教学工作量最低、薪资最高的群体。

与此同时，终身教职的比例越来越低，书中写道，美国各院校本世纪初的终身制教职员工比例从1976年的45%下降到25%，如今还在继续下降中，大多数非终身教职人员的续聘机会十分渺茫。同样逻辑，当一个“临时工”竭尽全力、战胜无数人、获得终身教职后，他们也会成为目前高校体制的捍卫者，继而使得这种机制更为固化。

终身教职和临时教师的分化，不仅仅在高校内部造成了隔膜甚至阶层，还影响了高等教育。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生，因为所面对的教师不同，接受的教育也有着极大差异。完全没有时间进行学术研究的临时教师只能充当零工式的教学机器，仅仅为学生提供“课程商品”，而且全社会的实用主义驱动，更加使得高校教育从启蒙转向“实际”，无论学校还是学生，目标都变成了就业。正如有人所评价，“学生以及家长是购买学分的消费者，文凭成为打开就业市场的敲门砖，知识用完即弃，理想遥不可及，校园里满是赶时间的人。”启蒙理念下的“个性化”也变成工厂式的标准化生产，进一步加剧社会阶层固化。

1940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发布了《1940年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制教职原则的声明》，其中表达了终身制教职的基本理念：

> 研究自由是探索真理的基础。教学方面的学术自由对保护教师教学权利和学生学习自由权利至关重要……终身制教职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手段，具体包括：（1）教学、研究和校外活动的自由；（2）足够的经济保障，使该职业对有能力者（不论男女）充满吸引力。出于学术自由和经济保障的考虑，设立终身教职制度，对于院校成功履行其对学生和社会的义务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这不仅仅是一种要求，也是理想。支持者会将第一项条款视为真理，因为学术自由意味着思想的多元化，当高校乃至社会包容这一切，就不会因为无法容忍异端而迫害知识分子。但反对者则无法容忍“永不会被解雇”的特权。

不过不管怎样，在只有不到5%的成年人口拥有本科学历，大萧条导致的失业阴影仍然令人心有余悸的当时的美国，这种对高校教师的保障是一种社会需求，也是人心所向。但到了今天，这种理想化确实有些不合时宜，因为有能力的人越来越多，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却被排除在终身教职之外，因此制造了更大的不公平，也成为美国社会面对的难题。